

中国第一艘“水上飞机母舰”

“镇海”号是中国第一艘“水上飞机母舰”，1937年底，为阻碍日军而自沉于青岛港。这艘“航母”是怎么来的？

水上飞机母舰

1909年，法国人克雷曼·阿德提出了将飞机与军舰结合在一起的浪漫设想，“航空母舰”的概念首次面世。1912年，英国人将一艘旧巡洋舰改造成专供水上飞机使用的作战平台，这实际上是一种简易航母，飞机只能从水上起飞和降落，一般称之为“水上飞机母舰”，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航母。不过，这种简易航母使得英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唯一拥有舰载飞机的参战国。此后西方列强纷纷加入航母研发竞赛。到1922年年底，日本人建成了一艘可供飞机在甲板上起飞和降落的航母，命名“凤翔”号，这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航母。

当西方掀起航母热时，中国正处于“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一群大帅打得天昏地暗，海军完全不受重视。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有一次亲临前线，遭到了敌方海军舰炮的狂轰，差点丢了小命。张作霖意识到海军的价值，于是将“吉黑江防舰队”的海军人才沈鸿烈挖过来，委托他组建海军。为掩人耳目，对外称“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特设航



警处”。沈鸿烈早年留学日本江田岛海军学校，非常关心中国海军发展。

1923年，沈鸿烈得知烟台“政记轮船公司”有一艘大吨位运输船，原为德国海军运输舰，排水量2700吨，航速为12节，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海军运输舰，一战中德国战败后，该舰被卸下武器后沦为地方商船。在张作霖的大力支持下，沈鸿烈遂软硬兼施将其购入。该船在旅顺口日本海军基地改装以后，配置了4.7英寸口径主炮2门、3英寸口径副炮4门，命名为“镇海”号。

此后，沈鸿烈又陆续购入日制商船“广利”号和拆去武装的日本退役鱼雷艇“白鹰”号，后来奉军又俘获了一艘俄造破冰船。“镇海”号和这三舰奠定了奉系海军的基础。海军建设初成后，沈鸿烈将目光转移到了自己关注已久的航母上。

然而以当时奉军一己之力，建造正规的航母无论是技术还是资金都不太切合实际，因此沈鸿烈决心从建造简易航母——“水上飞机母舰”着手，迈出中国人发展航

母的第一步。

因内战而名声大噪

1924年，在沈鸿烈的建议下，张作霖下血本向法国订购了8架“施来克”FBA-19型水上飞机。这种型号飞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上飞机，一共只生产了9架，而张作霖一口气拿下了其中8架！

1926年，原隶属直系渤海舰队的“海圻”号新式巡洋舰被沈鸿烈收编，“镇海”号的主力舰地位遂被其取代。沈鸿烈当时正在筹建“水上飞机母舰”项目，闲置下来的“镇海”号于是成为改造“水上飞机母舰”的不二选择。沈鸿烈请来外国技术人员将“镇海”号彻底改头换面，“镇海”号于是摇身一变成为可搭载两架水上飞机的简易航母，成了中国海军史上第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奉系海军因此也成为中国最早拥有海军航空兵力量的舰队。

“镇海”号尽管不是正规航母，但是，在当时中国弱小的海军力量里头，可谓是独步天下的利器。1927年，张作霖为夺取制海权、切断南方革命军北上的海上交通线，发动了针对南方闽系海军的军事行动。本来奉系海军力量远不及闽系海军，但由于有“镇海”号利器壮胆，奉系海军连续多次主动攻击闽系海军，屡屡得手，缴获颇丰。尤其是“镇海”号携带的舰载机多次

出动轰炸敌方目标，给闽系海军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慌。惹不起躲得起，闽系海军无奈之下只好退入长江避战。奉系海军由此将制海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镇海”号亮相后的出色表现让它名声大噪，“水上飞机母舰”很快成为各方海军势力竞相发展的新宠，落后的中国海军力量于是迎来了一股“航母热”。

为抗日而自沉

“镇海”号作为中国第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很可惜其主要业绩是在军阀内战、甚至是在对抗中国统一的革命中实现的，但是它也有写满荣光的几页。

1928年后，奉系海军拥有了另一艘可同时搭载8架飞机的飞机母舰，“镇海”号退出火线，成为东北航警学校的练习舰和实习舰，为中国海军培养了大批人才；1930年，中英两国《交收威海卫专约及协定》签署，“镇海”号作为国民政府外交次长王家桢的座舰，见证了威海卫回归中国的历史时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日军占领青岛前夕，12月26日，“镇海”号接到最后一道命令：卸下舰炮自沉于青岛小港码头，构筑限制日军南下的阻塞线，“镇海”号拼着老朽之躯，以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为中国抗击日军奉献了最后一丝余热。龚知栋

拍张照片
弄掉个直隶总督

1909年11月15日，清朝政府为慈禧太后举办了隆重的“奉安”大典。所谓的“奉安”，就是指皇帝、皇后的棺材下葬入陵墓。这场慈禧太后的葬礼，耗费高达120万两白银。慈禧太后的灵柩由7920人轮流抬运。送葬队伍浩浩荡荡，足足五天才走到终点——普陀峪定东陵。

在文武百官及朝中显贵的注视下，慈禧太后的葬礼即将开始。然而，就在这一刻，一束耀眼的光芒和一声巨响突然打破了现场的宁静，部分人员以为发生了行刺，引发一阵骚动。

案子并不复杂，被抓的两个人很快竹筒倒豆子一样全招了。他们两个是天津福生照相馆的尹绍耕和尹沧海，并没有行刺的企图，而是出于商业目的，希望拍摄葬礼场景并出售给外国人以获利。然而，这一行为在这一敏感时刻和地点发生，导致整个事情变了味。因为在审讯中，尹绍耕和尹沧海二人透露了一个事情——他们是由朝廷重臣之一的端方带进来的。这个供词非同小可，一下子将朝廷内部政治斗争的浑水给搅了起来。

很快，就有人以“妨害风水、破坏灵道、偷照御容、故意亵渎”为理由，要求严惩端方等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军机处很快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对端方予以革职处分，他就这样成了清朝历史上出任时间最短的直隶总督，尹绍耕兄弟二人也被判处十年的监禁。至此，这一事件算告一段落。

端方并非一位普通的大臣，而是晚清时期被称为“旗下三才子”之一的托忒克·端方。他曾是朝廷重点培养的对象，受慈禧赏识，曾赴欧美考察，在清末“立宪”事情上有重要影响。然而，慈禧去世后，隆裕太后有对慈禧太后的旧后部进行清洗之心；再加上摄政王载沣上台执政，对与袁世凯交往密切的端方不满，于是利用拍照一事作为导火索，把端方扳倒。郭歆

遭遇刺杀却死于“意外”的两位美国总统

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有5位在任总统遇刺，因此身亡的总统有4位：林肯、加菲尔德、麦金利和肯尼迪，只有里根一人幸免于难。

这5起总统遇刺事件中，林肯被子弹击中头部，于次日死亡。肯尼迪总统也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亡。加菲尔德和麦金利的伤情与里根的伤情相似甚至更轻，却在治疗过程中因为当时的医术所限，最终不治而亡。

被“饿死”的总统

1881年，加菲尔德总统遇刺身亡。他身中两弹，一弹擦伤手臂，一弹从背部右方射入。第二颗子弹穿透了第一腰椎骨，但未伤及脊髓，也没有击中其他任何重要器官、动脉或静脉。这只是一个非致命伤，放在现在，住院两三天就可能解决问题，当年却在折腾79天后，以加菲尔德死于败血症而告终。

很多医学史专家认为，加菲尔德很可能不是死于暗杀本身，而是死于当时医生

所犯的过错。

首先是误用仪器，未能找到子弹。X射线1895年才发现，20世纪初才应用于医学实践，因此当时的医生自然没法用它探明子弹的位置。但在当时，美国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电话发明人贝尔立刻设计了一种利用电磁场探测金属的电子仪器。使用该仪器时，周围不得有任何其他金属存在。但加菲尔德当时躺在有金属框架和弹簧的床上，医生忽略了这一点，导致探查失败。事实上，这种仪器后来被沿用多年，效果一直很好，直至被X光机取代。

其次，医生没有严格进行无菌操作，导致伤口感染。为了探明子弹位置，至少有十几位最权威的医学专家先后探测了加菲尔德的伤口。他们往往是徒手或用未经消毒的金属器具，这是当时普遍采用的方法。更可笑

的是，加菲尔德的肝脏还在检查时被捅破，增加了感染的可能性。大规模感染可能是导致加菲尔德死亡的主要原因。

饥饿也是加菲尔德的死因之一。医生错误地判断子弹可能已穿透这位总统的肠道，因此，严格限制他摄入固体食物，只经由直肠灌输营养液和药品。加菲尔德本来体重超过90千克，去世时体重竟只有原来的一半。有人评论说：“总统基本上是被这些医生饿死的。”

当时美国的医学正处于转型期，医疗实践没有标准化、规范化，存在诸多学术派别，加菲尔德也成为各种似是而非的疗法的试验品和牺牲品。

没被找到的子弹

加菲尔德去世20年后，麦金利总统在出席泛美博览会时遭遇枪击，身中两弹。

第一弹从肩部进入胸部，后被取出。第二弹穿过胃、胰和肾，停留在腹腔后部肌肉中，一直未找到。8天后，总统因伤口严重感染而死亡。

枪击事件发生后，麦金利立即被送到距离博览会最近的急救室抢救。但这间急救室条件十分简陋，连电灯都没有——尽管博览会上有大量电灯在展示。毫无准备的医生们不得不临时找些反光的器皿反射太阳光到手术台作为照明光源。子弹定位的问题仍然没能解决。X射线仪正在博览会上参展，但医生担心该仪器可能有副作用，所以拒绝使用。

感染也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第二颗子弹在体内引起溃烂，拖延8天后，伤口周围已经腐烂，产生坏疽。如果能用上抗生素，麦金利总统基本上不会有生命之虞。只是40年后，抗生素才开始广泛使用。严家新